

旱区农户生活实录



马友才说,家里来客人就要跑到数十里之外的镇上去买菜,这个季节菜很贵,最多能买点四季豆、莴笋之类的蔬菜。莴笋可能都干死了,因为这一带从去年九月份以来就没有雨水了。喂牲口的水大都是淘菜水,至于水牛,因为饮水量比较大,洗脸和淘菜用水显然是不够水牛吃的,喂水都是在河沟低洼处挖的沟道。

记者在田里看到,现在村民种的辣椒已完全枯死,只有四季豆还处于“半昏迷”状态。如果再不担水去浇的话,生机渺茫。

马友才说,他一家子人种了3000多株芒果树,挂果的有2000多株,去年芒果卖了2万多元,收入非常不错。今年遇上干旱,到现在心里面一点底都没有,如果再不下雨,可能大部分芒果树都要绝收。

“芒果树太多,实在没有办法去挑水来浇灌,也没有那么多的水来浇灌啊,3000多株啊。没有办法,只能靠天了。”

马友才今年还撒了两百多元的豌豆种,准备收豌豆苗卖。尽管每天坚持给豌豆地浇水,结果还是收效不大,很多豆苗都干死了,今年豌豆苗也就只卖了一百多元,连本钱都不够。

为何不买农业保险

记者闲谈中问马友才,有没有买农业保险?“没有,农业保险意义不大。”

马友才认为,他们平时很少遇到这样的自然灾害,如果遇上了,真吃不起饭,“相信有民政部门救济资金解决缺水问题”。

在村路一旁,一头水牛在吃洒落在地上的干枯玉米梗。

红格镇的镇党委书记沈虹说:“天干旱,耕牛都没有吃的,不知怎么办才好,如果再旱,只有组织人员送水了。”

马友才说,近日来,村里最主要的农活是挖水沟,找水源,然后从沟里挑点水给农作物“输液”。

宋金银说,他们已经挖了十多天了,才找到一口水源。找到水源十分不容易,村民们挖了一周后才出水。当时村民非常高兴,带头的村民还特意把女婿找过来帮忙。

宋金银动情地说,村里要给乡亲们建个大

的蓄水池,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。记者看到,这个“大”蓄水池面积大约6平方米,深度4米左右,方才见到不足半米的水量,水很混浊。这是乡亲们的饮用水。

大旱中的艰难生计

3月底,在云南曲靖市已是仲春时节。火辣辣的太阳烘干了大地,走在干燥无雨数月的乡间路上,狂风吹来卷起阵阵尘土,让人无法躲避。

由于连续数月的干旱,云南曲靖市目前有128.2142万人出现饮水困难,其中学校师生8.1309万人。

在曲靖市驾车乡钢厂村,乡党委书记高朝位向记者介绍说,乡上要求干部职工下到村组,划片定村,包村包组,组织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旱自救,采取节约用水、科学用水、村内相互调剂、群众自救拉水、乡政府组织有计划送水等措施,不让一个村、一户人家发生吃水困难,不让一头大牲畜因缺水死亡。

记者跟随高朝位来到钢厂村小学,查看学校水窖的藏水情况。由于连续数月的干旱,水源得不到及时补充,学校仅有的两个水窖里的水已“所剩无几”。

高朝位告诉校长,乡上将尽快采取措施,向学校送水,全力保障全校师生的饮水安全。

看完学校,高朝位对记者说:“听说钢厂村距东川方向5公里有一股清泉,我们去找找,看能否引到村里来。”便匆匆与记者告别,徒步向山里的方向走去。

蓄水池变成“游乐场”

钢厂村是曲靖市会泽县旱情最为严重的村庄之一。记者刚到村口,就遇到78岁的张顺富和77岁的孔祥富等老人,他们正要翻山越岭到6公里外的水源点背水。张顺富说:“反正我们还能动,闲着也是闲着,就出来背点水,不拖累大家。”

他们使用的塑料桶每只可装25公斤水,这对已过古稀之年的高龄老人来讲,桶已经够大了。

钢厂村是一个有1800人的大村落,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陆续修建的水渠、水塘一直供养着这个村子里的人们。现在,60年不遇的大旱让全村的水源完全断流,蓄水池完全干涸,人

畜饮水和生产用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。

在钢厂村数十年一直供全村人饮用的大蓄水池旁,记者看到水塘显然已经干涸多日,看不到一点湿气,风一吹掀起了阵阵尘烟。塘底宽阔平缓,村里的不少孩子在塘底玩耍、嬉戏。显然,宽大的水塘俨然像一个天然的“游乐场”,成为孩子们的“乐园”。

事实上,从2009年7月以来,云南曲靖市降水明显减少,高温、少雨天气一直持续。全市降水比历年同期偏少了34%~66%,其中马龙、沾益、师宗、罗平、宣威5个县(市)偏少了50%以上;2009年7月至今年2月,平均气温较历年平均值偏高1.4℃~1.8℃,降水量和平均气温分别为自有气象记录以来同期最少值和最高值。

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,预计曲靖市3月降水量偏少,4月降水量正常,5月降水量偏少,5月开始偏晚,大约在5月下旬开始。由于曲靖干旱降水量只占全年降水量的13%,3月和4月是曲靖的季节性干旱期,多年全市月平均降水量仅为24毫米和37毫米,3月、4月的降雨难以解除旱情。

极有可能的是,在接下来的近两个月的时间内,钢厂村蓄水池的“游乐场”功能仍将继续。

大旱加深贫困

本该是农忙的时节,但钢厂村的百姓除了取水外,大部分三三两两聚在干涸的大水塘周围,无所事事地晒着太阳唠嗑。

小春这一季,整个钢厂村农作物全部绝收。因为秋冬季节的干旱,全云南省秋冬播农作物受灾面积最大,达到3228万亩,占已播种面积的87%,绝收1451万亩。预计全省小春粮食(夏粮)将因灾减产60%左右,全省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已达170亿元。

据曲靖市民政局统计,目前,该市受灾人口达398万人,冬春缺粮人口42.5万人,当前因旱缺粮人口40.2万人,预计到8月份缺粮人口将达82.7万人。而扶贫部门统计显示,截至3月20日,因灾返贫人口39.4637万人,贫困程度进一步加深83.0421万人。

与此同时,曲靖市发改委价格监测、统计,粮食价格涨幅较大,2月份全市本地地产米(标一)、外地产米(东北)、面粉(标准粉)、面粉(富强粉)、玉米零售均价,分别比去年同期分别上涨5.9%、32.5%、9.38%、6.25%、11.76%。

尤其是蔬菜价格涨幅较大。监测的15个品种比去年同期上涨37.51%,大白菜价格涨幅最大,上涨150%;茄子价格涨幅最小,上涨3.36%。不仅如此,各地还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抗旱任务。

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,由于人畜饮水困难点多面广,加上持续干旱天气,偏僻山区的人畜饮水困难日益加重,饮水困难的人数在不断增加。也由于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,为五保户、困难户、老弱病残户、留守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送水任务加重。而且,大石山区水源干枯面不断扩大,能提供饮水的水源水量不断减少,加上交通道路不便,路途遥远、送水量大、难度高,送水成本大大增加。

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,历史上旱灾给我国人民带来过惨痛灾难。据统计,我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发生

过较大的旱灾1056次,平均两年一次。

在1949年~1998年间,全国平均每年受旱面积3.24亿亩,相当于耕地面积的1/5,其中成灾面积1.31亿亩。全国平均每年因旱灾损失粮食123.8亿公斤。50年中就有10年发生严重干旱灾害(1960、1961、1972、1978、1986、1988、1989、1992、1994、1997年),受旱面积均超过4亿亩,成灾面积超过2亿亩,相当于五年发生一次旱灾。

面对频繁的旱灾,不少有识之士多次呼吁“积极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”,加大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,通过保费补贴等手段扩大投保范围;通过税收减免、财政补贴等政策手段,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进入农村保险市场,发展多种形式、多种渠道的商业保险;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,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等。

而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,许多地区的基层干部、群众对“农业保险”认识不足,投保意识淡薄,绝大部分农户根本没有投保。

有关资料显示,截至2007年底,中国已建成水库总计约8.7万座,其中病、险水库约3.7万座,占水库总数的42.5%。据水利部统计,中国现有的18.3亿亩耕地中,尚有9.59亿亩是没有灌溉条件的“望天田”,已建成的8.67亿亩灌溉耕地,灌溉水利用率也只有46%。

因此,有专家强调,各级政府要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,大力提高农业保险意识,建立现代农业保险市场,积极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,建立多层次风险防范机制。

60年来的中国大旱

1959年~1961年
河南、湖北、陕西、湖南、河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西、山西、江苏、云南等省1959年夏秋季节少雨、高温,干旱严重。1960年华北和西南等地春夏连旱。1961年上半年北方大部少雨干旱,江淮地区伏旱严重。3年全国受旱农田16.4亿亩,成灾6.9亿亩;3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.5亿公斤。

1972年
山西、北京、天津、陕西、宁夏、内蒙古、辽宁、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广西等省市区北方旱区长期少雨干旱,共减产粮食103.5亿公斤。

1978年
安徽、江苏、浙江、湖南、湖北、河南、江西、山东、上海、辽宁、河北、山西、陕西、四川等省市受旱。不少地区江河断流,水库、塘坝干涸,地下水位下降,人畜饮水发生困难,庄稼早死。

1988年
山东、河南、湖北、安徽、湖南、江苏及河北、山西、陕西、浙江、内蒙古、辽宁、四川、贵州等省区冬季雨雪稀少,春季山东、河北、湖南、湖北、云南出现旱情。夏季黄淮、长江中下游一带伏旱。秋季北方冬麦区又出现不同程度干旱。全国受旱农田4.9亿亩,成灾2.3亿亩。

1997年
河北、山西、河南、山东、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吉林等长江以北地区降水显著偏少,春夏秋三季均出现旱象。黄河断流累计长达222天。当年全国受旱农作物5亿亩,成灾3亿亩。

1999年
山西、河北、陕西、内蒙古、辽宁、山东、河南、北京、天津、甘肃、黑龙江等省市区北方冬春连旱之后,夏秋又出现大范围严重干旱。全国累计受旱面积4.52亿亩,成灾2.49亿亩。

2000年
河北、山西、内蒙古、北京、天津、山东、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湖北、安徽等省市区全年大部地区降水偏少。全国年内受旱农作物6亿亩,成灾4亿亩;有3800万城乡人口一度因旱出现饮水困难。

据《中国经济周刊》

摆脱“伪幸福”的可能结果

与幸福对应,“伪幸福”是今人创造的新概念。在汉语词汇铸造中,伪和幸福似乎是第一次对接。可以说,社会有了不小的“伪幸福”的人群,有了“伪幸福”的生活形态和情态,才有了“伪幸福”这样的说法。“伪幸福”实在不好维持下去,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一线城市,有部分年收入在5万至10万元左右的家庭,正准备摆脱大都市带给他们的“伪幸福”,去二三线城市追寻真正的幸福。(据3月28日《中国新闻网》)

“伪幸福”还不完全等于不幸福,不幸福就是不幸福,而“伪幸福”者似乎还有一些幸福的虚幻,似乎还残存了一丁点儿的幸福。那些“伪幸福”的人,尽管生存压力大,劳累的身心与表面光鲜的工作形成巨大反差,但在平时,他们却要竭力装出幸福的样子。就是说,“伪幸福”的人,是一些在人前披着幸福伪装的人,他们常会制造出一些看似幸福的光彩与响动。

幸福的人的幸福都是相似的,而“伪幸福”的人却各有各的伪法。“伪幸福”人群中有大量的房奴,他们可以在网络这一虚拟的场所尽情地宣泄苦闷、忧愁,但他们不可能把这类情绪不加伪装地带到生活中,带到职场中。“伪幸福”人群里有为数不少的处于亚健康状态的男男女女,他们的身体上的亚健康和心理上的亚健康都是累出来的,都是由焦虑、焦躁带出来的。日常消费高,钱不够花,生活节奏又那么快,还有人情之烦、之累,操不完的心,层出不穷的不如意,这些东西让许多“伪幸福”的人亚健康了。人没健康,谈何幸福?但是亚健康的人处于各种考虑,生活中都还要装出健康的样子,精神抖擞的样子。

“伪幸福”的人们欲摆脱“伪幸福”,从一线城市移居到二三线城市,像是场集体出逃。这种自觉与非自觉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学里所说的“集体行为”,即在相对自发的、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情况下,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行为。这样的行为源于一种集体恐慌,而卷入这些行为的人们的目标和期望是既清晰又模糊。脱离一线城市的“伪幸福”,所奔向的就一定是幸福吗?这可能只是一厢情愿。对于幸福的理解,言人殊。幸福在于对生命的积极发现,幸福在于创造,幸福在于对生活的选择与取舍,幸福还在于人的感受能力的强弱。没有这一切作背景、作基础,人挪活就难以成为可能,结果倒可能是,“伪幸福”的人从这一个“伪幸福”奔到了另一个“伪幸福”。 今语



网络公关公司操纵舆论

据报道,一些所谓的“删帖公司”,自称“网络公关”,删条负面帖动辄要价数千元,并由此形成了庞大的灰色利益链条。为了给某个企业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,网络公关公司会聘请大量的发帖者撰写帖子,他们被称为“水军”,每发一条信息可以获取五毛钱的收益,因此也被称为“五毛党”。

网络公关公司操纵网络舆论的唯一标准,是涉及的企业肯不肯按他的价码掏钱。一家企业哪怕产品质量再次、网上消费者的指责声再高,只要舍得出钱,就能令网络上的“负面信息”转眼间烟消云散,而代之以一片捧场叫好声。这样的“舆论”只能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,为经济领域内弄虚作假、以次充好的恶劣风气推波助澜。 吴之如 文/画

乡官骂人有理,农妇回骂有罪?

65岁农妇不满镇政府征地补偿,拒绝丈量土地。农妇的儿子说,镇党委副书记说母亲是“母老虎”,母亲回骂了一句,当场被几名工作人员带走,至今未归。他们去派出所问,获知母亲已被拘留了。(《河南商报》3月30日)

读完这则新闻,笔者心头立即浮现起一句“古语”:只许州官放火,不许百姓点灯。乡官骂人就可以,农妇回骂了一句就不行,竟然被强行拘留法办,当真是荒谬到了极点。这种“不讲理”的个体逻辑尚且在其次,更令人遗憾的是:权力一生效,果然后果很严重——乡官一声喊“给我抓起来”,就涌过来一群执法人员将一个65岁的农妇抓走。

“你们先骂的人,为啥要抓人?”被抓农妇的家人这样呼喊。其实,在当时的语境下,就算是农妇骂乡官,也够不上被拘留的程度。换言之,乡官可以蛮横不讲理,但作为警权力的派出所,展开执法活动却不能“意气用事”吧——乡官说抓人就抓人,说拘留就拘留,将法律置于何地?

农妇回骂被拘,让我想起了某地的一起“骂官获罪”案:一名居委会主任酒后骂了镇党委书记和派出所所长,最终被公安局以涉嫌“侮辱罪”立案。由于该主任是人大代表,人大开了两次会,最终支持了对该主任实施刑事拘留。还有前两天发生在某县的“水杯门”:65岁老农寇克兴找乡长说事时,又渴又饿的他拿起办公桌上一个水杯欲喝

水,被乡长喝止称这是个人用的水杯。两人发生口角后出现肢体冲突,随后乡长喊来警察,农民被拘留7日。

这三起事件都有某种“异曲同工”之处——只要乡官一声喊,当地的警权力就蜂拥而上,不分青红皂白,“先给我抓起来!”拘留是一种司法手段,必须要依法为之,但在上述现实范例中,当地警权力的“拘留”,所遭殃的并不是“事实”和法律准绳,而是权力的意志指向。就因为权力的“生气”,司法就变成了宣泄权力私愤的“私器”。

种种悖理之处,种种的权力蛮横,再一次发出了令人压抑和沉痛的警示:在权大于法的背景下,公权越界下的司法力量会异化为暴力和严酷的工。权力可以通过干预司法而实现权力意志,损害公民,与之相对应的是,民权在公权面前是无比地渺小和乏力。这位骂人的乡官说农妇是“母老虎”,可天底下有这种说抓就抓的“母老虎”吗?

法律,绝不能成为某些基层霸道公权的“守夜人”。尽管类似事件属于个案,但也必须引起重视。我们应该对此类个案背后的诸多潜规则保持足够的认识 and 思考,只有通过组织架构的诸潜规则保持足够的认识和思考,从法律条文上加强对民权的保障,让制度有效规范和制约权力的运行,才能避免“乡官骂人有理,农妇回骂有罪”的荒唐重演。 陈一舟

“胶囊公寓”是对高房价的控诉

78岁老人黄日新在北京海淀区六郎庄设计了一批“胶囊公寓”,每间面积不到两平方米,却可躺、可坐、可看电视、上网。黄老称,他“不为赚钱,只想找到一种解决刚毕业大学生过渡房问题”的办法。(3月30日《华西都市报》)

深圳集装箱蜗居尚未淡出公众视野,北京老人设计的“胶囊公寓”问世。民众化解蜗居尴尬的民间智慧让人五味杂陈。长2.4米、宽仅0.72米的房间放一张单人床都捉襟见肘,又如何设计成“五脏俱全”的公寓呢?如此紧凑的住房,住起来恐怕并不舒服。尽管老人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刚毕业大学生的过渡房问题,老人准备把“胶囊公寓”租出去,但是并没有多少毕业生对这种没有起码居住尊严的“胶囊公寓”领情。老人设计“胶囊公寓”与其说是一种民间智慧,还不如说是一场吸引眼球的行为艺术,是对当下楼市暴涨局面的无情讽刺。

按照世界惯例,正常房价收入比是3至6倍,然而不少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出现了严重扭曲。以北京为例,2009年8月,北京市的房价收入比已达27:1,超出国际平均水平5倍。市区楼盘正在向5万元/平方米的天价迈进,就连北京周边的燕郊商品房也突破了万元大关。深圳市房地产信息网监测数据显示,2009年2月,深圳市新房成交均价10988元/平方米,而去9月达20940元/平方米。几个月的时间深圳房价涨幅达到90%。房价飙升,显然难言正常。去年12月14日,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在参加央视《面对面》节目时直言自己买不起房。副部长级官员都买不起商品房,普通民众拿什么买房?刚毕业的奴族拿什么租房?

从经济学的角度看,房价走向到底如何,应由购房者与开发商在市场框架内博弈。开发商主动放弃暴利心态,还原房价成本,才是理顺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,支撑楼市健康发展的关键。如果房价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相差太大,楼市除了释放一些刚性需求外,缺乏持久繁荣的原动力。在我看来,“胶囊公寓”问世的现实语境,实际上给当下楼市暴涨局面开出了中肯的药方。虽说住房消费已经进入了市场化时代,房价走向应向消费者与开发商在市场框架内博弈。但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面面看,作为百姓重要生活资料的自用住房,不仅仅是一种商品,它实际上带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,让百姓“居者有其屋”,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。这一方面提醒地方政府体现责任担当。打破房地产财政思维,降低地价与税费让利于民,为房价理性发展提供市场原动力。另一方面也提醒开发商改变暴利思维,主动还原房价成本。如果地方政府不走出房地产财政怪圈,在降低地价、税费方面尽到责任;开发商不放弃暴利心态,楼市繁荣局面恐怕难以持续。 刘凯玲